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17时24分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张岂之先生1926年10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张先生是第六届陕西省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1994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张岂之先生是崇文弘道的学术大家。他承继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统，著述宏富、成果突出、影响深远。曾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独著、主编各类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岂之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他一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先生是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先生务实开新，主导综合改革，率先探索和开展联合办学，为学校事业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岂之先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探路人和先行者。他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先生主持和指导的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黄帝文化论坛等，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研究与普及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岂之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等教学与研究工作75载，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倾注了全部赤诚与毕生心血，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那盏灯

□ 陈若星

张岂之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是从澎湃新闻上看到的。那天下午在家，手机弹出一条推送，标题里出现先生的名字，我点开看了几遍，反反复复确认，心里忽然空了一块，眼泪就那么落了下来。先生是百岁高龄的人了，按说早有心理准备，可当真到了这一刻，还是觉得恍惚。

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我父亲陈世夫成了同班同学。这桩旧事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起，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成长。

1944年，父亲从四川老家奔赴昆明，报考了西南联大哲学系。翌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员北归，父亲随学校辗转——先坐船从昆明到海边，又乘海轮经广东、香港，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抵达北平，进入北京大学，与张岂之、汤一介诸君成了同窗。

父亲家里清苦，祖父走得早，祖母一只眼睛失明，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当时北大的学生食堂分“白面膳团”和“杂粮膳团”两种，父亲始终是杂粮膳团的常客，能吃上一顿细粮和肉食非常不容易。张先生和汤先生家境相对宽裕，逢年过节或隔些日子，两个人便轮流把父亲叫到自己的家里“打牙祭”，有时去张家，有时去汤家。孟昭燕阿姨那时已与张先生相恋，每次都帮着张罗，热饭热菜端上桌，父亲说那不只是填饱了肚子，是心里也暖了。这些话他说了一辈子，我也听了一辈子。

家里有一本旧相册，里面存着一张1948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拍的照片。张先生穿着长衫，孟阿姨穿着旗袍，胸前佩戴着鲜花，两人并肩而立，年轻而端正。父亲和诸多同学站在一旁，人很瘦，拍着手笑着。那是张先生和孟阿姨订婚时拍的。父亲说同学们都管孟阿姨叫“昭君”，因为她是北京姑娘，一口京片子清脆悦耳，人又生得端庄清丽。

1952年，张先生受侯外庐先生之邀，到西北大学任教，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当时，班上有两位同学选择了西北，一位是张先生，另一位就是父亲。父亲先是去了西北局工作，后来又参与创建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两人同在西安，守着一座城，各自扎根，彼此支持。张先生的夫人孟昭燕老师也始终陪伴左右，两人相携数十年，是学界有名的伉俪。

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是在张先生家度过的。那时候物资匮乏，但孟阿姨总有办法让饭桌丰盛起来。她做的豆腐丸子白菜大烩菜，粉条吸饱了汤汁，肉丸子外酥里嫩，白菜炖得软烂，一大盆端上来满屋飘香，就着大馒头，我每次都吃得意犹未尽、唇齿留香、流连忘返。饭后还有节目——张先生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可以放唱片听音乐。而更让我惦记的是孟阿姨讲的故事。冬天的傍晚，屋里光线暗下来，我和张先生家的小妞子、小鸽子、小莺子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孟阿姨靠在藤椅上讲《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芝麻开门”四个字从她口中念出来，我仿佛真的看见一扇石门在面前缓缓打开，那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张先生通常待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偶尔出来倒水，看见我们坐成一排，便笑一笑，摸摸我们的头，转身又进去了。他个子高，身形瘦削，话不多，但那个笑容我一直记着。

1977年恢复高考，在工厂当缝纫工的我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没有经过太多犹豫，心里大概存着一个念头——想去张先生待的地方看看，也想知道那扇书房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世界。入学之后，每次见到张先生，他都会问起读书的进展，开了什么书单、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也时常在学术上给我指点，提出做人方面的要求。他讲话向来简省，一句是一句，没有虚言。每逢有学术报告时，我会挑选角落的位置坐着，听张先生讲中国思想史，满场安安静静的。他一生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那些学说很深，但他讲出来让人觉得亲切。我在后排听着，偶尔会恍惚觉得，小时候那扇神秘的书房的门扉，正在慢慢地向我打开。

后来去了报社，经常去看望张先生和孟阿姨成了固定的习惯。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学术上的也好，做人的也好，都趁着拜访的机会跟他聊一聊。他总是先耐心听完，再慢慢作答，说到关键处会停顿一下，看着我，像是在确认我是否真的明白了。

后来我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去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拍着手表示祝贺，说这不是挂个名的事情，要把基层的声音带上去，替老百姓说话。此后我写提案，也会去向他汇报。他总是在听我说完后，便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在方向上给予点拨，偶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有一年我准备写一份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提案，他从书房里拿出自己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递到了我的手里。

那几年提交的几份提案，后来被收录进“75人话75年”系列报道，《各界导报》也做了报道。每一份提案从选题到成型，都跟张先生汇报过。那些年跑基层、走访调研的劲头，有一半都得到了张先生的支持。

前些日子《光明日报》还在头版刊发过关于他的报道，题目是《张岂之：治学育人，“乐此不疲”》。我读了，心想先生这一生确实做到了不知疲倦。他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学与研究七十五载，培养的博士、硕士和博士后达五百余人。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张先生走的那天，我翻出旧相册又看了一遍那张订婚照。七十多年前的影像已经泛黄，穿长衫的年轻人和穿旗袍的姑娘并肩而立，父亲在旁边拍手笑着。那时候他们都还不知道，往后的路会通向西北，会在黄土高原上扎下各自的根。

张先生是7月19日傍晚走的，享年百岁。西北大学发布了讣告，社会各界纷纷悼念。我在家里坐了很久，想起许多往事——想起那碗豆腐丸子白菜大烩菜的滋味，想起“芝麻开门”那句密码，想起书房里透出的灯光。每次从张先生家离开，走到楼下回头望，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那些年我一直觉得，西安城里有一盏灯是照亮着许多人的，这些人里也包括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永远也忘不了。

如今那盏灯不会再亮了。

可是被那盏灯照亮过的人，心里便有了光。那束光，是真诚，是善良，是对美好永远的追求。

（作者系第十一届陕西省政协委员、文化艺术报原总编辑）

深切怀念张岂之先生

□ 王子今

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入学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们心中，张岂之先生是永远的恩师。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在张岂之先生任历史系主任时开始即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他请李学勤教授、田昌五教授来校兼职，使得学生们见识了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学术路径的大家风范。张岂之先生秉承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视理论重视思辨的科学传统，对于考古学这样以实证为第一的学问，也予以积极支持，他对于陈直先生学术方向的肯定，影响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张岂之先生对于西北大学历史系77级有特别的关心和引导。这个年级的两个班——历史班和考古班，涌现出不少学术英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朱玲、魏道儒、王震中、彭卫。考古学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则有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刘莉和秦汉考古大家焦南峰。

我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受到张岂之先生诸多教示。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汉代的斗兽和驯兽》，就是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在《人文杂志》1982年5期发表的。这已经是44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参加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2005年9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承担秦汉三国部分撰写任务。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听到学界朋友发表的批评意见时，张岂之先生指示我依据史实，诚恳作答，后来争议遂得澄清。我受林甘泉先生指令，撰写《“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律》一文。成文后未能获得林甘泉先生满意。他几乎重写了这篇文章，署名“林甘泉、王子今”（《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张岂之先生是全书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就此耐心指教我，应当重视理论的应用，以指导史学学术研究。

在西大校园里，在清华林荫路，许多次漫步交谈，他的教导至今依然响在耳边。记得近年所得教诲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不一定非要写大部头的书，一是要少喝酒。这样的嘱咐虽然一不留神可能淡忘，但是话语中对后辈学子的真爱，我会永远深记在心。

我曾经为张岂之先生的随笔集《春鸟集》写过一篇书评，题为《自然之风·自由之羽》。其中说：“以欢欣自由的‘春鸟’比喻知识分子积极活跃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精神，可以说是别有意蕴的。”张岂之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人文”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之外，又有“自然”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中许多精微之处，其实都是在这种和“自然”的共鸣中表现出某种接近“自由”的神韵的。今天，张岂之先生真正地走向“自然”，走向“自由”。我们怀念他，并由衷诵念：“张岂之先生千古！”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与张岂之先生交往二三事

□ 张海青

惊闻张岂之先生仙逝，五内俱崩，眼前不仅浮现出与先生生前交往的点点滴滴。曾经有过做先生博士的想法，因故未考。虽不能执弟子礼，然仍以晚辈下属的身份能与先生相识亲沐先生恩泽而倍感荣幸。先生是大师、大家，亦是普通人，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现就工作中与先生的往来回忆若干，相信你读了之后也会做如是想。

给先生写信

1988年暑期，我与学校几位老师一同去哈工大、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学习考察，归来后深感西大在某些方面与人家的差距。也许是受先生亲和开明治校风格的鼓舞，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学校党政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斗胆上书”，放在校长信箱里。不几日，便听说先生让校长办公室全文刊发了我的意见书，并亲自加了按语。在按语中，先生充分肯定了我提的建议，要求各部门认真学习整改，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我得知后受宠若惊，深为先生雍容大度从善如流的精神所感动。记得我所提的“应该给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评职称”建议，促使学校把政工干部职称评定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外省高校有开展的，但陕西省内高校还没有）；我所提的“集体会操制度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应予取消”的建议，直接叫停了学校当时已经实行的要求隔日早上学生做广播操的规定。过了没几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下文在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生体质达标活动，其内容有与我的建议不谋而合之处。自此以后，我对先生的敬佩之情有加，每次相遇必以先生相称，几十年来，竟也混了个脸熟。

请先生吃饭

先生曾经在副校长任上兼任过西北大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2000年初，我和时任社长王进成同志一起赴京参加全国高校出版社社长总编会，决定利用会余时间专程去清华大学看望先生。先生听说我们要来，非常高兴，早早就沏好茶等着我们。北京的初秋虽有几丝凉意，但先生的住处却如沐春风。席间，先生就高校出版社的历史使命、未来发展趋势、西大出版社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学术著作策划、出版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论述和指示。谈话完毕，先生执意要请我们吃饭，我们说这怎么能成呢！（后来我们请先生就近在清华园内一饭馆吃了个便餐）记得临出门时，先生一边穿衣一边从衣兜掏出一沓钱来，笑着说：看我现在在这里“打工”，还能挣点零花钱还能请人吃饭哦。说得大家都乐了。

给先生拎包

我退休前负责过一段省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培训工作。2015年夏，一年一度的省高校书记校长读书会在丈八沟宾馆举行。7月23日下午，请先生做大学文化方面的专题报告，我和委厅有关领导一起去接他。车门打开，先生从车上下来，我赶紧伸手想接过他手里的皮包和水杯，先生客气了一下，结果还是交给了我。我们一边往报告厅走一边交谈，先生环顾左右对我们说：看我状态还行吧！我现在外出开会出差坐飞机都是一个人，提个箱子来去自如，一点问题都没有。同行者连连点头称是，我说：愿先生百岁无虞。须知，先生当时已近八十九岁高龄，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全无一点老态。

先生果然是有德有福长寿之人，今驾鹤西去，晚生无以为报，唯有泣诗悼之。

惊闻噩耗悲心痛，哀挽声声满域中。谁说文章寂寥事，千秋仰慕大师风。

［作者历任西北大学管哲系（现公共管理学院前身）党总支副书记、西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陕西教育报刊社社长等职］

张岂之先生与西北大学的美育教育

□ 倪文东

惊闻母校西北大学老校长张岂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彻夜未眠，想起我在西北大学学习、工作二十多年间，多次聆听先生授课，当面向先生请教的情景，历历在目。特别是在三十多年前，我面呈先生《关于成立西北大学艺术教研室》的报告，先生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亲自批示，将报告中建议的“艺术教研室”改为“美育教研室”，后经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筹备成立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开展美育教育，为大学生开设美术、书法、音乐等选修课，后来美育教研室改为艺术系，到后来成立了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岂之先生对西北大学的美育教育具有开启之功，也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母校西北大学艺术系工作二十多年，后来调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从事书法专业教学，直到2020年退休。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留到母校西北大学工作，当时西北大学没有艺术专业，更没有书法课，于是我被作为行政干部留到学校组织部工作，成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组织部作秘书的三年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和誊写各种公文和干部考察报告并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但我学书法、教书法课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解，而且越来越强烈。开始我是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练字，后来干脆在办公室里练字，编写书法讲义，默默地编织着我的书法教育梦。

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有书法，一心要教书法课。我认为具有百年历史和雄厚文科背景的综合名校西北大学不设置艺术学科，不给学生开设艺术类课程，不开书法课，是很大的遗憾。我反复给学校领导谈我的构想，谈西北大学设立艺术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的语言和行动终于感动了张岂之校长。那时候国家的大形势也比较适合，国家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开始重视艺术教育与美育教育工作。

1984年，我手写了万余字的《关于成立西北大学艺术教研室》的报告，张岂之校长认为我的报告很有价值，在大学生中进行艺术素质教育很有必要，而且他认为名称叫“艺术教研室”过于普通，与其他学校没有区别，不如叫“美育教研室”更为确切。现在想起来，张岂之校长真是高屋建瓴，深刻领会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教育理念和思想。

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由我协助当时的教务处长薛迪之教授筹备成立“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任命薛迪之教授担任美育教研室主任，我兼任秘书。我与刘孟老师去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外调，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调来水彩画家梁文亮先生，又从印染厂调入庞永红老师，从西安音乐学院调入李茵老师，开始陆续给大学生开设美育课程。

经学校研究同意，美育教研室聘请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文西教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方济众先生、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泽秦先生为艺术顾问。还专门召开了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成立大会，张岂之校长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并代表学校向三位艺术顾问颁发聘书。

美育教研室正式成立后，学校任命梁文亮为美育教研室主任，老师们积极筹备，开始陆续给全校大学生开设美术欣赏、素描基础、色彩基础、水彩画等美术类课程；开设音乐欣赏、视唱练耳等音乐课程；开设书法欣赏、硬笔书法、书法基础、篆刻基础等书法类课程，在全校积极开展美育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增长学生们的审美知识。还邀请全国著名的美学家、漫画家华君武、缪印堂等到西北大学举办专题讲座，召开美学研讨会，在陕西甚至全国高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1984年至2001年，西北大学先后有近千名学生选学了我的书法课，受到了较系统的传统文化和书法技法教育。同学们在作业中写道：“在书法选修课上，我们学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掌握了技巧。这里不是枯燥的说教和生硬的灌输，而是尽情自愿的吸收，使我们在欢娱之中获得知识和美感，并学到一技之长。”后来我还在1996年第3期《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从美育与德、智、体育的关系看美育教育》一文，总结西北大学的美育教育及自己对美育教育的教学经验和认识。2001年我调到北师大工作后，还与任大援先生一起去清华大学看望张岂之先生，先生知道我到北师大任教，非常高兴，勉励我努力工作，认真教书。2005年，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20周年，我与任大援、方兢、于翠玲、江源、孙晓敏等西北大学在京校友积极筹备，在北师大召开了“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张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讲话，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把学校美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院8位老教授回信，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美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对文化文艺工作又提出明确要求；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发文《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目前国家从上到下，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美育教育。四十多年前，西北大学在张岂之校长的支持下，就开始重视学校美育，1985年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美育教研室，引进和调入专业美术、音乐、书法教师，在全校学生中开设系列美育课程。西北大学的美育教育离不开张岂之校长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张岂之校长的关心、支持，就没有西北大学美育教育的开展。

我写这些文字，以此来悼念、怀念张岂之先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